

时代「进步」的双面刃

— 赖和小说的反殖民与现代性思考*

翁智琦¹ · 崔真娥² · 须文蔚³ · 金惠俊^{4**}

目录

1. 前言
2. 时代如何接受赖和？
3. 反殖民意涵：质疑法的体制
4. 现代性葛藤：'启蒙'的对话
5. 结语：在当代(重)读赖和的意义

국문제요

라이허는 타이완 신문학의 아버지이다. 그의 작품에서는 일본식민통치시기 일본으로부터 타이완으로 전입된 현대성과 일반민중생활의 변증법적 사유방식에 대해 서술한다. 라이허는 전통적인 문인인 동시에 새 시대의 지식인이기도 하였기에 타이완 전통문화의 중요성에 대해 깊이 인식했을 뿐 아니라 그 시기 새롭게 대두된 현대적 지식에 대해서도 수용할 수 있었다. 라이허는 본업이 의사이지만 문학과 사회운동에 더

* 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PNU-RENovation(2021-2022)*.

** 1. 왕즈치 釜山大学校 中语中文学科 客座教授(主著者)
 2. 최진아 釜山大学校 中语中文学科 副教授(共同著者)
 3. 쉬원웨이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学系 教授(共同著者)
 4. 김혜준 釜山大学校 中语中文学科 教授(通信著者)

육 열정을 다한 인물이었다. 따라서 그는 타이완 신문학과 문화운동의 중심적 위치에 자리하였기에 라이허라는 인물 자체, 그의 문학과 사상은 줄곧 타이완 사회에서 정치 변화의 기호로 동일시되어 왔다. 신시기의 지식인인 라이허는 문학의 대중화를 통해 타이완 민중이 문화적 계몽이 될 수 있기를 기대하였다. 나아가 문화적 계몽으로써 타이완 민중을 단결시켜 일본의 식민통치로부터 타이완 민중이 평등한 삶을 획득하는 힘을 쟁취하기를 희망하였다. 그러나 식민주의적 현대성은 라이허에게 모호하고도 고통스런 경험을 가져다주었다. 식민통치시스템의 수립과 이에 동반하여 온 현대성은 타이완 문화 속에서 양날의 칼과 같은 역할을 하였다. 즉 현대화라는 것은 훌륭하게 개선된 변화를 가져다준 동시에 자기 자신의 문화에 대해서는 오히려 상처를 남길 수 있었다는 것이다. 이러한 현대적 '진보'의 모순은 라이허의 소설 속에서 독특하게, 진보의 모순 안에서 당면한 라이허의 사유과정을 보여 주었다. 이러한 맥락에 따라 본 논문에서는 《신편라이허전집》에 의거하여 라이허라는 하나의 기호가 타이완 사회에서 어떻게 수용되었고 그의 소설에서는 어떠한 방식으로 반식민주의와 현대적 계몽을 변증법적으로 사유했는지를 제시하였다. 결국 이는 지금 이 시대에 라이허의 의미를 다시 읽어 내는 작업인 것이다.

중심어: 식민주의적 현대성(殖民現代性), 계몽(啓蒙), 반식민주의(反殖民), 라이허(賴和), 신소설(新小說)

1. 前言

‘啊!时代的进步与人民的幸福原来是两件事,不能放在一处并论的哟。’¹⁾这是赖和(1894-1943)作品中时常被引用的一句话。这句话除了能显示赖和作品被阅读过程的标志理解之外,事实上也表现了赖和作品中的特质,即:他对日本殖民政府所带来的现代性以及普罗大众生活的辩证性思考。赖和本职是医生,却在文学领域中留下盛名,因此,他的同辈作家杨守愚(1905-1959)称赖和是‘台湾的鲁迅,台湾新文艺园地

1) 赖和(2021a:147).

的开垦者」。曾经主编新潮文库的医生作家林衡哲(1939-)称赖和为「台湾现代文学之父」。赖和的同时代作家王诗琅(1908-1984)提出应以「台湾新文学之父」称赖和,这也成为如今普遍对赖和的称号。赖和属于世代交替时期的跨世代台湾知识份子,是「台湾文化协会」初创时期的理事,他曾参与早期的「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堪称日治时期第一批组织化行动的创始者与参与者。

赖和既受传统汉文教育,亦受殖民现代教育,因此在新旧文学方面皆有创作展现,他的汉诗文本涉及与清代汉学、台湾汉学传统的联系。他的新文学作品,包含小说、新诗与散文,有著开创性地位与独特美学风格,其中,小说是赖和奠定文坛地位的重要性文类。²⁾透过这些作品,赖和针对日治时期的重大议题展现许多深刻思考,他不仅批判种族、法律、警察、殖民教育等殖民体制所带来的统治暴力,也积极建立启蒙思想、本土传统与阶级观点,呈显殖民地知识份子的精神图像。

赖和的文学开创性之一,在於他是台湾初次将白话文写成小说的作家。由於赖和积极参与文学社团与政治运动,且在担任杂志文艺栏编辑时,不吝推荐其他台湾作家,因此他在日治时期也成为重要的文学领袖。赖和在作品中对殖民政府的批判以及对民间文化的挪用,使得「赖和」也成为台湾文学中反外地文学、反殖民者文学的重要抗争与认同符号。然而,由於赖和的人道关怀与批判特质,赖和的文学与接受史在战後台湾的特殊政治环境中也呈现了相当复杂的面貌。

赖和的写作时间虽不算相当长,却累积了不少作品。他写作小说的时间从1923年起,正式发表小说则是1926年,直至1935年为止。根据2021年由国立台湾文学馆与前卫出版社出版之《新编赖和全集》的调查研究,赖和作品共计有汉诗989首³⁾、小说24篇、新诗60首、随笔散文48篇、翻译2篇。赖和的作品中所展现的思想与艺术的复杂度,以及「赖和」符号在台湾特殊历史情境中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象徵意涵,使得赖和研究目前在台湾学界已经累积相当可观的成果,学位论文、期刊会议论文以及各式评论杂文,加总约有一千馀篇。

自1994年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台湾研究室与赖和文教基金会合办「赖和及其同时代

2) 陈建忠(2011: 196)。

3) 989首汉诗作品包含稿本906首、刊本83首。

的作家：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国际学术会议後，赖和研究就集结了台湾、中国、美国、日本等地的学者参与。目前韩国学界也能见出已累积了一些赖和研究成果。比如，宋承锡的博士论文与其专书曾讨论部分赖和作品⁴⁾，金苑研究赖和作品的台湾话文与乡土文学论争以及当中的台湾性⁵⁾，金尚浩将赖和与韩龙云之民族意识新诗并置讨论⁶⁾、于翠玲比较殖民时期韩国蔡万植与台湾赖和的批判性文学外，也另文讨论赖和文学的台湾话文问题⁷⁾，金惠俊、李高银则是於2012年翻译出版《蛇先生》⁸⁾，该书集结了赖和的8篇小说，并在书後的〈解说〉中指出，8篇小说皆有指责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并希望能提升台湾的民族主义之涵义。⁹⁾

目前为止，韩国学界主要关注赖和文学中的批判性与台湾话文所展现的台湾文化、台湾性之问题。然而，随著2021年《新编赖和全集》的完成，赖和部分未刊行或未出土之作品，也有了新的研究斩获，本文即是基於珍贵新史料之出土与运用，针对赖和小说作品进行阶段性的整合研究。

作为新兴知识份子的赖和，他向来擅於以台湾话文形式在小说中展现丰富的辩证思维，那是受殖民现代性影响，伴随而生的既暧昧又痛苦的思考。诚如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中所言：

赖和接受现代化的进步观念，所以他能够客观地发掘台湾旧社会的迂腐与落後。……赖和撰写这些小说的迫切心情，几透纸背。他知道，现代化是无可抵挡的。台湾社会若不进行文化改造，则永无翻身之地。然而，他更清楚现代化对台湾社会也具有双刃性的作用。台湾若不追求现代化，就必须接受被支配的命运。不过，现代化并非是从台湾社会内部自发性产生，而是由日本人以强制性手法加诸台湾人身上。因此，殖民地知识份子如赖和者，已深深体会到文化上的两难。如果台湾人要抵抗殖民统治，就连带要抵制现代化；如果要接受现代化，则又同时要接受殖民统治。这种矛盾，在赖和及其同时代作家的文学

4) 송승석(2004)；송승석(2006).

5) 金苑(2010a: 113-136)；金苑(2010b: 343-364).

6) 金尚浩(2008: 179-212).

7) 于翠玲(2014: 343-361)；于翠玲(2016: 457-472).

8) 김혜준, 이고은(2012).

9) 김혜준, 이고은(2012: 169).

中表现得最为鲜明。¹⁰⁾

也就是说，殖民体制的建立与随之而来的现代性，是台湾文化的双面刃，当现代化带来好的改变时，同时也会对自身文化造成伤害。赖和相当在意文学大众化，他积极进行民众的文化启蒙运动，然而当启蒙精神与民众所热衷的民间文化产生矛盾或扞格时，赖和也不时陷入窘迫的无奈。施淑曾指出，‘台湾新文学之父’凸显了赖和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台湾的鲁迅’则概括了赖和的文学精神。在赖和的作品中，能将上述双重意义完整表现出来的，是赖和的小说。¹¹⁾综上所述，本文希望透过赖和小说作品，展现出反殖民与现代化所带来的思考纠葛。也就是说，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是，当小说中的反殖民意涵透过面对殖民体制而提出控诉时，现代性启蒙又是如何在民间对话中，为赖和这位新兴知识份子带来何种思考的矛盾。

2. 时代如何接受赖和？

前述提到，赖和研究除台湾学者多所投入外，也集结了中国、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的学者。这除了显示赖和文学具有能代表在地之台湾性以外，事实上他的文学也展现了世界性。透过赖和的作品，得以让不同国家的学者连结反殖民、在地性、本土性等议题进行思考。然而，这样具有台湾性与世界性的赖和研究，事实上也显现出不同时代的接受面貌。整体而言，赖和研究的接受史颇能展现台湾社会的复杂认同政治。

根据陈建忠的研究，赖和在文学史中的定位以及‘赖和文学’的符号在不同时代的运用，在台湾历史中有著复杂情境。¹²⁾在日治时期，便出现赖和相关评论，如张我军(1902-1955)、毓文(1912-1980)描写赖和印象¹³⁾，王诗琅提出定位赖和思想特质之议题¹⁴⁾，黄得时(1909-1999)则将赖和称为‘台湾的鲁迅’，展示了赖和与台湾新文

10) 陈芳明(2011: 85).

11) 施淑(1994: 1).

12) 陈建忠(2011: 69-92).

13) 张我军(1989: 251); 毓文(1934: 397).

学运动的系谱，此时‘赖和’作为符号，已具有抗争与认同的时代意义。¹⁵⁾1943年赖和去世後，《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之‘赖和先生悼念特辑’透过杨守愚、杨逵(1906-1985)、朱石峰(1903-1951)的纪念文字，确定了赖和在日治时期被当时的文学知识份子视为领袖与导师的说法。可以说，日治时期的‘赖和’符号，之所以被赋予反殖民与抗争的意义，除了赖和写出具开创性的文学作品外，也与他参与政治运动，以及台湾文学面对日本殖民者有意忽视与打压的反动等因素密切相关。

1945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面对新的政治局势，台湾文坛也有了新的变动。在全岛学习中国文化与语言之馀，台湾文学作家群也积极想恢复因战争而受挫的日治时期台湾文学传统，赖和便成为战後初期首先被提出来让台湾民众重新认识的作家。在这时期，杨守愚为文强调赖和对鲁迅的崇拜，从而引出赖和努力延续民族意识的努力。¹⁶⁾杨云萍(1906-2000)在其主编的《民报》文艺栏，重刊赖和‘辱?!’，并以〈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回顾〉一文定位赖和为‘台湾创作界的领袖’¹⁷⁾。杨逵也在其主编的《文化交流》刊出赖和〈善讼的人的故事〉，并有预定出版的消息。¹⁸⁾由於当时国民党政府作为‘祖国’，接收台湾之後的‘光复’举措，是掠夺与贪污，使得许多民众相当失望。因此，这些台湾作家在定位赖和之时，其实也是藉由赖和提出一种抵抗不平等统治的认同政治。也就是说，一方面强调赖和的民族气节以回应国民党政府规范的民族意识主旋律外，另一方面则是藉由赖和文学的特殊性强化台湾文学的特殊性。¹⁹⁾

台湾在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後，《台湾新生报》发生‘桥副刊论争’²⁰⁾，台湾文学

14) 王锦江(1936).

15) 叶石涛(1999: 101); 叶石涛(1999: 17).

16) 杨守愚(1945: 11).

17) 杨云萍(1946: 13).

18) 杨逵(1947: 18).

19) 陈建忠(2004: 43).

20) 《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由歌雷担任主编，是战後初期台湾文学发声的重要平台。‘桥副刊’自1947年8月1日创刊，至1949年4月11日为止，总共出刊223期。歌雷希望透过副刊做为一座桥梁，试图连结本省与外省籍作家，在副刊的园地上进行对话交流。当时，‘桥副刊’上论及台湾新文学重建的文章众多，著墨的议题也不尽相同。最为显著的差异在於对於台湾文学的定位问题，也就是说该以什麼视角看待台湾文学。张怡宁，‘‘桥副刊论争’，台湾文

被部分战后来台的作家视为‘受殖民遗毒、奴化的边疆文学’²¹⁾，引发台湾作家，如吴新荣(1907-1967)、朱实为文回应²²⁾，而此时，赖和再度被强调为台湾文学中具有特殊性与主体性的象徵。

1949年之後，随著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台湾也涌入更多因国共内战迁徙而来的知识份子。国府一方面为了反共大业，必须稳固统治权威，另一方面还得加强岛内的反日政治宣传，1951年，赖和便因抗日有功，被入祀忠烈祠。然而，七年之後，由於全岛陷入白色恐怖的整肃氛围中，1958年时，赖和突然因为一纸省政府的公文指出有共产党嫌疑，而遭逐出忠烈祠。²³⁾当时，台湾社会弥漫著恐共气氛，无人敢声援赖和被逐出忠烈祠一事，从那时开始，直至1970年代，赖和研究遭到中断。

1970年代，在保钓运动、回归乡土运动的浪潮下，知识份子對於民族与乡土文化有了新的再现、改革与批判意识。萧阿勤指出，这些文化再现、改革、批判意识等知识建构的路径，围绕在如何重新认识台湾的过去，以理解过去、规划未来。其中涉及的核心要素，是历史叙事与认同的维持、变迁与发展。²⁴⁾在这一波被萧阿勤称为‘回归现实’的思潮中，具左翼色彩的《夏潮》杂志集团有著相当积极的活动。他们大量重刊日治时期作家作品，如赖和、吕赫若、杨华、吴浊流等人的作品。在经历十多年的中断後，赖和的作品被重新刊出，《夏潮》甚至有〈赖和是谁？〉²⁵⁾一文，问出了戒严时期的历史创伤与失去的记忆，并让赖和与其文学重新被发现。此时的赖和论述在当时反帝国的民族主义风潮下，特别强调他热爱(中华)祖国与反日的情怀。²⁶⁾

由於许多日治时期的资料出土，赖和研究因政治因素中断十多年後，此时开始累

学主题平台，<https://nmtl.daoyidh.com/en/main/litoverview?region=AOT1&artId=EVT14288> (2022.11.1. 검색)

21) 陈建忠(2007: 141-170).

22) 史民(1948: 12); 朱实(1949: 1).

23) 参见朱真一，‘赖和前辈120岁生日回顾(3)：入祀、逐出、复入忠烈祠’，民报，<https://www.peopledia.tw/news/ec612535-4f89-46b7-ad1f-fed747b5e266> (2022. 11.1. 검색).

24) 萧阿勤(2010: 5).

25) 梁德民(1976: 56-59).

26) 陈建忠(2011: 84).

积较多成果，并在1980年代有了大幅进展。‘赖和’作为符号在过去一直与认同政治有关，然而到了1980年代，开始有研究专著於讨论赖和的文学美学与思想维度。²⁷⁾ 1984年，在侯立朝、王晓波、李笃恭等人积极为文与陈情下，赖和得到平反。内政部以公函表示：‘可确定其非文协左派或台共分子，而属于文协的民族派，是倾向中华民国之抗日烈士。’於是，赖和重新被请入忠烈祠。²⁸⁾

1987年2月，叶石涛(1925-2008)出版《台湾文学史纲》，除了独立建构出从日治至战後的台湾文学史观外，也将赖和形象呈现为关切台湾命运的面向。之後，林瑞明以《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成为当代赖和研究的先驱者与奠基者，2000年则主编《赖和全集》²⁹⁾，将赖和作品进行系统性地整理。1994年的赖和及其同时代的作家研讨会中，有多篇论文不仅讨论了赖和的小说、散文、新诗、汉诗等文类，也有关於赖和左翼思想或文学语言的议题。等於说，在1990年代，时代已能以多样性和文学性的角度接受赖和。之後，除了抗日文学角度的讨论外，也能看到民间性、汉诗新思想等诠释角度，更加深化并拓展赖和研究。³⁰⁾

到了2011年，陈芳明出版《台湾新文学史》，相较于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台湾新文学史》是更加完整而详善的文学史专著。该书以後殖民史观提出台湾文学史的历时性观察，并简明扼要地概括赖和与其文学的重大贡献。从1980年代後至此，随著台湾文学主体性的确立，‘赖和’俨然成为‘想像台湾、建构台湾’的文化符号。2021年，蔡明谚与国立台湾文学馆、前卫出版社共同合作《新编赖和全集》，不仅重新针对诸多赖和作品进行原稿比对、校对、修订、加注，甚至还挖掘出尚未出土之新作或以为遗失之手稿，让赖和的作品资料库更为完善，也透过新史料、新全集版本的出版，让当代读者得以重新思索‘时代进步’的双面刃议题。

27) 花村(黄春秀)(1983: 24-38); 陈明台(1983: 39-47); 施淑(1983: 48-54).

28) 参见朱真一，‘赖和前辈120岁生日回顾(3)：入祀、逐出、复入忠烈祠’，民报，<https://www.peopledia.tw/news/ec612535-4f89-46b7-ad1f-fed747b5e266> (2022. 11.1. 검색)

29) 赖和(2000).

30) 陈建忠(2011: 87-88).

3. 反殖民意涵：质疑‘法’的体制

一般认为，日本殖民台湾的统治前期所遵循的法理来自於‘差异对待’。也就是认为台湾刚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份，除了必须以武力维持殖民地秩序以外，在经济、文化、社会等等面向也与殖民母国有所不同，因而必须采取特殊治理方式。而殖民统治在1920年代开始，日本对待殖民地台湾的政策则以‘一视同仁’为依据，也就是同化政策时期。然而，无论是差异对待或是一视同仁，事实上，对于种族的想像并无差别。³¹⁾

台湾与日本同样属于东亚文化圈，尽管政治对立，文化却具有相似性，而在国体意识思维的主导下，日本同化政策虽以‘一视同仁’为依据，但仍呈现出矛盾和断裂，无法完全掩盖被殖民者在各种层次所受到的不平等对待。³²⁾当时的知识份子意识到殖民政府透过种族差异在台湾进行的殖民统治，因此他们也在思考著如何团结台湾本土群众共同努力，推动反殖民论述，为摆脱殖民地地位创造契机。从这角度而言，赖和的小说颇能提供我们对日本殖民时期重大议题的关注，其中「反殖民」的思考更是阅读赖和小说的抵抗精神时相当重要的切入点。

赖和由於亲身经历过治警事件³³⁾，并遭到羈押，对于国家暴力的各种施行路径，比如法律、警察、教育等，在多篇小说作品，如〈僧寮闲话〉、〈不幸之卖油炸桧的〉、〈一日里的贤父母〉、〈一杆‘孺仔’〉、〈阿四〉、〈不如意的过年〉、〈让步〉、〈可怜她死了〉、〈丰作〉等作中皆有深刻描写。

在1923年治警事件发生那年，赖和年底入狱，隔年一月出狱。该事件显然对赖和造成重大打击，也影响了赖和往後的创作方向。赖和在1923年陆续写作〈僧寮闲话〉、〈不幸之卖油炸桧的〉、〈一日里的贤父母〉以及〈尽堪回忆的癸的年〉四篇小说，皆未刊

31) 汪俊彦(2013: 117-118).

32) 郑力轩(2006: 146-153).

33) 治警事件为发生于1923年台湾总督府压制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的政治事件，称为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总督府针对该次事件进行全岛大逮捕，相关人士49人遭拘押，50人家中被警察搜索或遭传讯，引发台湾社会高度关心，并激发民众高度参与设置议会的请愿连署活动。参陈翠莲，‘治警事件’，台湾大百科全书，<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35>(2022.11.1. 检索)

行。其中,〈僧寮闲话〉、〈不幸之卖油炸桧〉、〈一日里的贤父母〉明显将批判矛头指向殖民体制,杨翠就曾在2014年召开的彰化研究学术会议中指出,赖和在这一批较早期创作的小说中,叙事者时常展现积极介入的实践者形象。³⁴⁾

〈僧寮闲话〉是目前已知赖和最早的小说创作,³⁵⁾小说描述了两人某日一同前往菩提寺参与超渡法会,因而开启与寺庙和尚關於善恶判定之对话。小说中两人遇到和尚正在调护一位乞丐病人,发现病人其本来是蛮横地主,不知何故企图自杀未遂,而病人跟叙事者‘我’的朋友,刚好有一件未解官司。当时和尚对著他们说了句:‘善恶到头终有报!’引起‘我’质疑善恶如何分别?善恶标准又在哪?和尚突然兴奋演说了起来:

我反要问汝,人类是要生存的麼?那麼凡保持他的生存手段,可能说他是恶麼?但有时候只顾自己的生存,侵害他人的生存手段,那可说他是善麼?勇於战争,汝敢说他是恶麼?但杀人的事,也可说是善麼?就汝心中所信的善恶,不论什麼时候,汝敢无所隐慝,一一直说出来麼?我打算当有不能。汝没看见麼?印度的圣人颜智³⁶⁾,不仅印度的人,信他是善人,世界除英国以外(我想英自国内的人怕亦有),亦皆称赞他、信仰他,现在不是被英政府监禁起来麼!(曾不闻国际间有说英是恶的国。)³⁷⁾

和尚举出了甘地为例,当时甘地正在英殖印度进行非暴力独立运动,希望向英国殖民母国争取印度自治。事实上,当时台湾知识份子也正由在日台湾留学生组织团体‘新民会’,向日本帝国议会争取在台湾设置自治议会的政治运动。显然,赖和透过和尚提出善恶辩证的问题以及甘地争取独立自主的亚洲现况,试图回应当时台湾社会的殖民地现实。而和尚讲完这一席话後,‘我’与朋友相当惊讶於和尚发言竟不像出家人口吻,和尚回以‘出家人也是人,当然能谈人的问题’。此时,‘我’与朋友心有戚戚焉,顺著和尚

34) 吴兰梅(2015: 437).

35) 〈僧寮闲话〉共有二稿,论者推测是赖和日记中提及的写作计画中的首篇「僧寮的烂丐」,‘赖贤涌用纸’是赖和在总督府医学院後期,於嘉义医院时期所用之稿纸。写作时间约在1923年。参赖和(2021a: 64).

36) 指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महात्मा गान्धी),小说此处的颜智是台语译名。甘地於1922年被英印政府逮捕入狱,1924年获释。

37) 赖和(2021a: 62).

的提问，直接指出台湾社会的变化：

朋：‘实在社会心理，已大有变化了，只如我，看那报纸上的不逞徒、不良分子，就联想他们是政治运动的实行者，或是固性觉醒之人，不然便是强权反对者。’

我：‘这是实在的事，我亦有同样的感觉，现在社会上，善恶是非将要倒置了！’

朋：‘有果必有因，使世间如此，这责任不晓得谁当负呢？’³⁸⁾

朋友所说的强权反对者，显然就是反对日本殖民政府高压统治者，而我指出‘善恶是非将要倒置’，则指出在殖民政府的统治下，人民早就潜藏抵抗之心，而这股反政府的心态，表面上是‘恶’，其实是因於‘善’的目的，也便是为了脱离不平等的殖民治理，营造更符合理想的生活罢了。两人后来又与和尚谈到法律的问题，此时和尚又说：

唉！冤枉了！汝原是顺良民，我错看了，这大千世界里，有什麽法律！但有支持特别阶级之工具而已，不过是一种权力的表现罢。试睁开慧眼看，那受法律所拘束的，尽有无告之善男子、善女人。且现在一辈之新人，不是把受罪入狱，视为光荣名誉……³⁹⁾

作为赖和第一篇小说作品，〈僧寮闲话〉虽未曾刊行，但赖和仍在创作初始就定下往後批判殖民体制的切入方式：国家、法律以及其施行者。和尚原与世俗应保持一些距离，然而小说中这位和尚却扮演了‘入世’角色，并且尖锐地指出，在现下社会，法律只是为特别阶级服务的工具，用以展现权力，而非是适用于所有人的规范。法律原本的规范整齐及治罪处罚的作用，一旦遇上殖民地体制，就有了阶级、人种之差异。和尚所提出的这类论述，其实在赖和之後的小说中屡见不鲜。

赖和的小说以对话体见长，而这样的对话体也能展现赖和小说中叙事者作为一种「中介型」知识份子的形象。他们往往是介於旁观者、聆听者、记录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的角色。这种介於多重位置之间的知识份子形象，也同时映衬了身为作者的赖和对于自身的观察、反省、批判和实践位置的多重挪移。不同於赖和在政治、社会、文化运动的长

38) 赖和(2021a: 62).

39) 赖和(2021a: 63-64).

期多方参与，赖和小说中的知识份子，往往以一种相对抽离的视角来观察殖民体制、社会运动者，并且彰显民众对殖民者与运动者的观感，甚至藉此抽身易位，观察运动中的自身，而形成独特的内/外批判视角。⁴⁰⁾

〈僧寮闲话〉以一般民众与僧侣之对话，营造社会现实的巨大转变。和〈僧寮闲话〉一样写於1923年，也未正式刊行的小说〈不幸之卖油炸桧的〉，则是以人民与警察的对话，凸显殖民地法律的不合理与荒诞。〈不幸之卖油炸桧的〉描述在冬日早晨，孩子顶著寒冷，沿街叫卖油条，没想到在派出所前被警察拉住，只因警察认为孩子叫卖声扰人清梦。孩子被继母要求必须外出卖油条，且要高声喊卖，才能招来生意。警察一听竟要孩子：‘做贼去好啦！’⁴¹⁾而後将孩子拉进派出所，打了孩子一巴掌，并命令他待在原地。过中午後，喝了酒的警察回到派出所，要求孩子给他磕头後，才愿让他离开。孩子回到家後，因没有卖出许多油条，被继母处罚。整篇小说以‘我’为叙述者，‘我’见证了孩子遭到警察扣押的窘境，虽曾试图搭救，却因无法抵抗警察权力而无言以对。明明警察是维护社会安良与正义的角色，然而这样的角色竟要一个穷苦的孩子去做贼，这当中的荒谬性，从小说中的对话清楚可见。

〈一日里的贤父母〉故事发生在某个倚赖渔猎收获的乡村。一天，警署公文宣布将有长官近日到村里来打鱼，因此规定渔民暂时不得打鱼，一律等待长官到来。是日，长官来到村里，号召讨鱼人聚集，对大家说要与百姓同乐，命令讨鱼人尽力捕鱼，鱼获多者有赏，讨鱼人於是下水努力捕鱼。间中有鱼人担心‘这样法子，怕此一回就清楚了，後日我们要怎样维生？’⁴²⁾众鱼人捕鱼至将近中午，溪中的鱼全数被捕猎，堆积好几千斤。长官叫唤厨师将渔获做菜，自行配酒吃了。村里丁壮、区长及满身湿透的讨鱼人立於一旁等候。长官吃饱後，将剩菜发给村人，剩馀大的、好的渔获，则吩咐送回县里，将要分送给上级。最後离开时，叮咛大家：‘父母大人的慈爱是不能忘的。’⁴³⁾

小说篇名〈一日里的贤父母〉中的贤父母，自然是指那位到村里打鱼的长官。所谓‘父母官’是以领导和爱护人民特点来以之称呼，然而小说中的父母官，非但未尽到照顾

40) 吴兰梅(2015: 437-438).

41) 赖和(2021a: 72).

42) 赖和(2021a: 84).

43) 赖和(2021a: 85).

人民的责任，反而将人民赖以生食的食物全数掏空，最後甚至宣称他的来访是一种‘慈爱’的行为。赖和在此相当直白地讽刺地方长官不体察百姓生活的蛮横作风。这样的地方长官来自警署，是国家施行治理权力的重要单位，然而警察的治理方式，竟是将人民的生活资源视作娱乐，甚至是讨好上级以达到权力巩固的资本。

《新编赖和全集·小说卷》由主编蔡明谔新发掘的一篇小说〈让步〉，也描述了地方长官对人民压榨的情形。〈让步〉在1930年发表於《现代生活》第3号。小说讲述地方长官收贿不断，时常运用权力要求民众主动送酒、食物甚至大大小小的红包。而当地方长官在酒楼饮酒作乐谈新的收贿生意时，听到他人说了一句‘不妨让一步’⁴⁴⁾，地方长官一口回绝以：‘让步？不中用的东西，让步。’⁴⁵⁾让步原意指双方发生争执时，为了避免发生冲突，而放弃自己主张或利益的一部分，以求事情和平解决。小说中的地方长官面对收贿打折，绝不让步，意指他绝对不放弃自身利益。在这样的状况下，被迫不停让步的只有被剥削者。为了不抵触殖民政府，人民只能接受地方长官予取予求的殖民生活。

赖和批判殖民权力最为著名的一篇，应该是他第一篇正式刊行的小说〈一杆‘孺仔’〉。从前述三篇未刊行的小说中，可以见到赖和不停思考何谓‘善恶’？善恶定义若因社会现实而有了改变又该如何区分？现实又是什麼呢？现实是台湾人民正生活在施行不平等对待的殖民体制中，而警察作为人民最能直接接触到的殖民权力象徵，往往展现了殖民母国看待殖民地人民的歧视眼光。这些问题，在〈一杆‘孺仔’〉中，可以见到赖和展现了更为成熟的叙事调度。

〈一杆‘孺仔’〉发表於1926年2月的《台湾民报》第92号。〈一杆‘孺仔’〉主角是佃农後代的秦得参，命名有谐音‘真的惨’之意。由於地主不再租地给他，秦得参改做菜农。妻子也为他借来孺仔，以利进行买卖。後来因秦得参不察巡警喜贪小便宜之心，反而遭到巡警羞辱，孺仔也被巡警折断毁损，并以违反度量衡制度为由被定罪入狱。秦得参在经历种种挫折与羞辱後，内心生起悲哀的情绪，他感到‘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麼世间。活著倒不若死了快乐。’⁴⁶⁾最後，秦得参带著必死的觉悟，选择与巡警同归於尽。

44) 赖和(2021a: 206).

45) 赖和(2021a: 207).

46) 赖和(2021a: 121).

‘欄仔’在当时是官厅专利品，也是商人赖以生工具。它代表丈量的标准，然而这个标准却被另一个执行官厅权力的巡警打断抛弃。巡警本该也是执行国家治理权力的标准，却由於自身索贿不成，打破另一个标准。赖和透过这样的情节，指控殖民体制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当殖民体制建制了法，却又自己打破时，法的原则与尊严何处安放？

类似的情形，在〈丰作〉也能见到。〈丰作〉讲述蔗农添福满心以为辛苦种植的甘蔗长得得好，期待能得到制糖会社的奖励金。然而那一年制糖会社临时更改新的采收条例，该条例严重剥夺蔗农利益，引发蔗农群起抗议，添福却忍气吞声，不去抗争。因为他担心若参与抗争，可能会拿不到奖金。最後甘蔗秤重时，会社却又将磅秤动了手脚，本来一万斤的甘蔗硬生生被扣掉四千斤，使得本来计算应有获利的添福，在还过种植成本与贷款後发现已无盈馀，未来生活可能会落入无以为继的境地。‘丰作’明明有著甘蔗盛产，蔗农丰收之意，却由於会社的苛刻采收条例以及动过手脚的磅秤，使得在〈丰作〉中，丰收的，往往是资本方，而非劳动者蔗农们。

〈丰作〉回应了一句台湾谚语：‘第一憨，种甘蔗互会社磅。’意思是，天底下最笨的，就属种植甘蔗让制糖会社秤重的人了。从中也可见农民对会社之愤恨不平。当时由於殖民政府在台湾实施糖业保护政策，也就是说农业产品被商品化，糖业被资本化，因而发生制糖业者壟断利益，导致蔗农在殖民体制的治理下被经济剥削。⁴⁷⁾当殖民政府与日本糖业资本奠下了技术条件、推广新品种与肥料使用、乃至强加轮作制度，深陷殖民体制中的农民，只能被迫转化为殖民者精心设计之经济计画的执行者与被压迫者。⁴⁸⁾

4. 现代性葛藤：‘启蒙’的对话

一般而言，现代性描述的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式的长时期演变。⁴⁹⁾根据英

47) 柯志明(2006: 24-25).

48) 柯志明(2006: 124).

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说法,‘现代化’(Modernize)的後果就是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的确立,‘现代性’不仅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理性化为特徵,更包含了近代‘民族—国家’企图对人类生活造成的一种改造,背後有相当复杂的权力运作网络关系。⁵⁰⁾若是从东亚社会来看,现代性课题有著两个重要面向:其一,遭遇‘现代’并非仅是思索如何因应‘新’与‘他者’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建构‘自我’;再者,在东亚社会浮现的‘现代性’并非‘单一的’或‘西方的’,而是多重且相互扣连的一组社会现象。⁵¹⁾

赖和身兼汉文系统知识份子,也是接受殖民教育的第一代新兴知识份子。赖和在进入殖民教育体系之前,一直以汉文与汉文化的学习为主,他也曾以汉诗传达身为启蒙者与反殖民者的思考。後来赖和放弃透过汉诗来介入现实,而是开始以白话文书写新文学作品来宣扬理念,这个写作语言的变化,显示赖和在接收到日本带来的新式教育与文明、医疗与卫生等现代性事物後,感受到了不得不选择的时代压力。⁵²⁾

在汉诗盛行的时代,台湾社会基本上属於近乎停滞的农业经济。等到成为日本殖民地之後,日本为了在台湾进行持续的资本与原料的压榨,事实上并非强取豪夺,而是有限度地进行资本主义化与现代化的改造工程,资本主义瓦解了原有的农村经济,导致台湾社会性格的剧烈变化。旧式的文学观念,难以适应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取而代之便是新文学观念的铸造。⁵³⁾对当时的台湾知识份子而言,构成两难的选择。如果要接受现代化,几乎等於接受殖民化;若是抗拒殖民化,也似乎同时得抗拒现代化。然而事实上,殖民主义和现代性是工业资本主义历史中不可分割的特徵。⁵⁴⁾台湾知识份子所面临的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便是殖民身份成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接受了殖民者带来的现代性之普遍性,另一方面却又难以跳脱国家性的箝制。因而在推展文化、文学运动时,台湾知识份子被殖民的身体内的现代性,便时常出现思考

49) 王志弘,李根芳(2003: 253).

50) 王铭铭(1998: 208-213).

51) 陈佩甄(2013: 104).

52) 陈建忠(2004: 132).

53) 陈芳明(2011: 44).

54) Tani E. Barlow(1997: 1-20).

或抉择的纠缠与葛藤。

赖和在1920年代之所以投入新文化、文学运动，正是因为殖民教育在台湾的推行，给了他对西方启蒙主义等传统的接触机会，从而成为新兴知识份子。从他的小说如〈阿四〉、〈雕古董〉、〈一个同志的批信〉、〈归家〉、〈赴会〉等作中，都能见出赖和遇到殖民现代性时，他的启蒙思考与矛盾，而这些矛盾，往往透过知识份子与殖民者、知识份子与民众的对话展现。

赖和带有自传故事色彩的小说〈阿四〉，约写於1930年初，未刊行。〈阿四〉讲述了一个就读总督医学院的台湾学生阿四，由於遇到医学体制内部的种族差异对待现实，阿四感受到屈辱之余，接触到从海外留学生传入的世界思潮，从而开始投入民族解放运动，参与台湾议会请愿活动，成为热心的启蒙运动者。

小说中，阿四遇到的第一个挫败是从医学院毕业後，即将到地方医院就职路上，在车上遇到一位日本人，与之攀谈时，该位日本人说出‘台湾人也可以说是日本人，还是说日本臣民较切当’⁵⁵⁾之语，阿四原先带著从总督医学院毕业的无穷希望与远大心志，期待自己能成为经新式教育加持过的文明现代人，没想到才刚自医学院毕业，就因为日本人特意区隔他者的言论而深深断伤。阿四的第二个挫败是在医院工作後，发现与日本同事同工不同酬的现实，阿四惊愕於薪水比日本人来的少，在说服自己只能忍受之余，第三个挫败随之而来。医院院长对院内的台湾医生们说：

你们一两年後是要去开业的，到医院来说给医院服务，毋宁说医院供你们实习较实在，我也认定你们是来实习，所以各科都任你们自由去见学，医院给你们特别的便宜，希望你们对医院不可有无理的要望。⁵⁶⁾

阿四对院长这番话失望透顶。原来，即便从总督医学院毕业，医院也未将他们看做正式医生。阿四尝试向医院提出建议，结果反而得到更差的待遇与处理，因而决定辞职回乡。阿四虽接受新式教育，然而经历了几次挫败，感觉到身为台湾人身份的自觉又矛盾的心情後，他被迫得自己回答这些复杂的身份认同问题，甚至感受到‘不时有法律

55) 赖和(2021a: 169).

56) 赖和(2021a: 170).

的眼睛在注视他，有法律的绳索要捕获他。’⁵⁷⁾而从海外传进的民族解放与启蒙运动知识，让阿四豁然开朗，‘他所抱的不平，所经验的痛苦，所郁积的愤恨，一旦晓得其所以然，心胸顿觉宽阔了许多。’⁵⁸⁾也就是说，因为接受了新式教育，阿四得以接触到海外启蒙知识，从而理解先前的‘不平’之感，其实是殖民支配体制所造成的，而这也促使阿四日後走上启蒙运动的道路。

和〈阿四〉同样带有自传色彩的另一篇小说是〈雕古董〉。如果说〈阿四〉是参考赖和念总督医学院到接触海外解放运动知识进而觉醒、启蒙的过程，那麽〈雕古董〉可以说是一探赖和从传统汉文人跨越到新兴知识份子的心路历程。

〈雕古董〉发表於1930年5月的《台湾新民报》，小说描述懒先生⁵⁹⁾是名西医，但对汉学曾经很用心。因为一次公开发言招来侮辱圣贤的非议，於是‘变了相’⁶⁰⁾，除了西医本业外，也写些白话小说。有天收到不明读者来信请教写作问题，懒先生刚写完回信，信件被突然到访的友人看见，友人并笑称这是玩笑信，懒先生将回信寄出後，不久收到退信，原因是收信者不详。懒先生这才想起友人的话，‘哈哈！雕古董’，他的确是被刻意捉弄了。

〈雕古董〉以有些诙谐的叙事写就，然而当中谈及懒先生从旧文人转变到新知识青年的侮辱圣贤事件，其实在现实中皆有所本。1921年10月29日，彰化青年会举办‘修辞会’，赖和当时在聚会上发言主张结婚自由、孔庙宜毁，因而引来其他儒者的反对与批评。⁶¹⁾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的1920年代初期，像赖和这样反传统的文化论述并非完全没有，然而他的确因为受到现代启蒙知识的影响，希望能遏制被当时文化保守主义者扭曲变形的孔孟儒学⁶²⁾，避免思想停滞不前，甚至恶化，不利於殖民地的启蒙运动推广。也因此，小说中的懒先生与友人谈话中互称对方是：‘叛逆者的党徒’⁶³⁾，话中的

57) 赖和(2021a: 171).

58) 赖和(2021a: 173).

59) 懒先生的人物原型为赖和，其字懒云。

60) 此处指性格、嗜好全部改变。赖和(2021a: 180).

61) 赖和(2021a: 180).

62) 陈建忠(2004: 161).

63) 赖和(2021a: 186).

‘叛逆者’事实上回应了赖和在写作第一篇小说〈僧寮闲话〉即提出的殖民体制下善恶难分，对抗者反而是人民欢呼对象的台湾社会现况，也宣告赖先生乃至於赖和本人，对于一个公平合理世界的热切探求。

〈赴会〉发表於1930年11月《现代生活》，小说写於台湾文化协会左右分裂前⁶⁴，赖和藉由车厢中两组人物的对话提出文协派知识分子的问题所在。叙述者‘我’在火车上准备前往雾峰林家花园参加会议，‘我’在车站时听到旁边两位绅士风格的男子，一位日本人，一位台湾人，就著新闻上的文化运动讨论起来。日本人以为知识份子应该对於这样的文化运动参与踊跃，然而台湾人则指出很多台湾知识份子反而是信赖殖民政府，相信不用去请愿要求，政府也会改进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然而，在农工大众间，文化运动反而受到欢迎，因为农工大众得以透过文化运动一吐平日不快，并获得同情。两人对话未完，‘我’因火车进站，赶紧进了票上所属的三等车。在三等车内多是劳动者阶级的乘客，‘我’此时又听见农民的对话，农民提到文化运动，质疑他们替咱谋幸福⁶⁵的实现可能，尤其阿罩雾（即雾峰旧名）富商虽参与文化运动，却仍对自家佃农相当无理、横逆。‘我听完后只觉怅惘、无奈，后来到了文化会议的现场，始终怀著杞人的忧虑，并感叹：‘啊！阶级、民族，这不祥的字眼，这作崇的意识。’⁶⁶

赖和透过〈赴会〉，指出了他对於当时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间，其实存在著阶级矛盾的看法。一方面，在〈赴会〉的第一组对话中，由日本绅士提出台湾知识份子应会踊跃参与文化运动的猜测，暗示知识份子参与社会改造应是相当符合时代潮流的作法，然而台湾绅士回应以台湾仍有许多知识份子相信殖民政府会主动改善殖民地生活的乡愿观点，指出启蒙运动在台湾仍需要内部极大的凝聚力量。另一方面，在第二组对话中，赖和以农民的对话提出劳动阶级对文协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的看法，而这组对话也表现了赖和以农民为‘主体’，从农民的视角看待殖民地现实的阶级认同。

64) 台湾文化协会是日治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启蒙团体，1921年成立。文化协会以文化启蒙运动为主，但后来由於引进各种政治思想，导致协会内部成员的运动路线产生分歧。更多资讯可参见陈翠莲，‘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大百科全书，<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34> (2022.11.1. 검색)

65) 赖和(2021a: 214).

66) 赖和(2021a: 215).

〈赴会〉指出的，其实正是赖和投身於文协多年後，对文协内部有产的知识阶级的立场与作法的质疑，而小说最後的‘啊！阶级、民族，这不祥的字眼，这作祟的意识，似乎也预告了文协未来走向分裂的命运。‘启蒙’原是知识份子接受新式教育後，希望能带给殖民地人民觉醒进而自我改造的方式，然而当启蒙运动与阶级产生冲突时，赖和身为其中一员，他敏锐地意识到运动本身的双重矛盾。

赖和所体悟到的矛盾，即是殖民现代性所带来的自我质疑与思考挑战。然而，赖和後来仍坚持启蒙必须从农民大众做起，在〈归家〉中，我们可以见到赖和作为一个从乡土游离出来的知识青年，如何仔细倾听故乡乡亲的对话。

〈归家〉发表於1932年1月的《南音》杂志，小说描写离乡读书的知识份子‘我’毕业後回到故乡，察觉故乡的诸多变化，并对这样的变化有了不好不坏的评价。後来，‘我在庙口遇上卖圆仔汤和卖麦芽羹的乡亲，因而加入他们的谈话。

‘我’显然是在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份子，多年後回到故乡时，便指出‘一件商品，在工场里设使不合格，还可以改装再制，一旦搬到市场上，若是不能合用，不称顾客的意思，就只有永远被遗弃了。’⁶⁷⁾从中可以看出，赖和透过‘我’担忧‘被遗弃’的恐惧，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逻辑即在於商品化及市场化。当‘我’回到故乡，发现一切都显得生疏时，再度增加被遗弃的恐惧。此处又指出知识份子与原乡因教育造成的生活、认知落差，所造成的陌生化现象。接受教育、启蒙究竟是为了什麼？是为了将自己打造成炙手可热的商品？是为了让自己脱离生命的原乡？赖和透过‘我’的恐惧，暗示了这些疑问。

而後，‘我所参与的两个摊贩的对话，直接凸显了知识份子与劳动大众的思想落差。‘我认为现在与过去好，却被摊贩回以‘你讲团仔话’反驳，摊贩甚至认为‘永过是真好！讲起就要伤心，我们已无生命，可再过著那样的日子了！’、‘永过实在是真好，没有现时这样警察……’。显然，摊贩们相对於‘我’，他们怀念的是经济宽松、没有殖民者的过去。即便三人後来讨论到教育问题，当‘我认为学习日语能提升社会阶级时，摊贩却指出提升社会阶级事实上是需要人脉协助的，并非单纯习得日语就能达到。‘我不死心地继续提出教育能涵养‘国民性’的功能，对话却因巡警突然到来而被中断。

〈归家〉中的知识份子，显然是接受新式教育，并且也认同同化政策的台湾人。然

67) 赖和(2021a: 286).

而他却未意识到新式教育的背後，是状似一视同仁，却仍有差別待遇的殖民体制。赖和透过‘我’与摊贩的对话，指出他的担忧即在於此。他推广启蒙运动，目的在於唤起台湾民众反抗殖民体制，争取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然而现况是台湾民众根本难以凝聚这样的认识。这个‘难以凝聚’也就成了所有关心殖民地前途的台湾知识分子的最大担忧。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担忧，赖和的最後一篇小说，1935年发表於《台湾新文学》的〈一个同志的批信〉，便透露了相当颓废而无奈的心情。小说透过一个在狱中的启蒙运动者，写信向有识阶级‘我’要求医疗费，‘我却将本欲寄出的钱，挪用给了来收贿的警察，小说弥漫著一股面对启蒙运动的浓浓挫败感。

赖和作为一名传统汉文人与新兴知识份子，他经验到社会实践和世界观之间的矛盾。现代性原意味著会带来所谓进步的一切，然而这些进步的一切，事实上，在殖民地现实中，充满矛盾与纠结。诚如施淑所指出的，他作为一个汉族遗民与启蒙思想者，或许可以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鼓励下，越过狭隘的民族局限，从新人类的角度幻想一个未来的、黄金的世界。但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提供给他乌托邦向往的进步的资本主义世界观，却反转过来无时无刻不在殖民剥削和压迫的事实下，提醒他民族的仇恨以及那合理世界的虚妄。⁶⁸⁾

5. 结语：在当代(重)读赖和之意义

本文乃基於《新编赖和全集》之新史料出土，从赖和文学中最具特色的反殖民与现代性角度，进行赖和小说研究。赖和既是传统汉文人，也是新兴知识份子，他對於传统汉文与新文学都相当用心。然而，正是由於他体验了传统汉文思想与新知识，意识到当下的殖民社会更需要的其实是世界新兴的民族解放、自决思想，因而毅然决然投入启蒙运动中。然而也在其中，赖和发现殖民现代性的冲突与矛盾。这便是本文试图从反殖民与现代性角度提出的观察。

赖和作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他身兼医生、文学家、启蒙运动者的多重角色，无论

68) 施淑(1994: 7).

是他的形象、文学或思想展现，都能体现时代的丰富内涵。尤其赖和在台湾不同时期，因为时代的限制或需要，被当成认同政治的符号诠释出多重面向，这是在作品研究外，相当特殊的现象，而这也显示出赖和在台湾社会中的特殊意义。因此，本文在第二章部分，梳理了‘赖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他如何被不同时代所接受。从日治时期的启蒙者、运动带领者形象，到战后初期的抗日觉醒者形象，甚至被请入忠烈祠。后来在白色恐怖时期，却又因为密告赖和具有左翼思想，被反共的国民党政府移出忠烈祠，赖和文学的讨论也因此中断十多年。直至1970年代，台湾进入思考、认知、反省现实的时代，知识份子除了批判帝国、资本主义外，也重视对现实的关注与历史记忆重建，赖和此时得以重新被正名，再度进入忠烈祠。而後赖和研究也随著更多史料的出土，引发几波研究热潮。

本文从赖和小说最为显著的反殖民与现代性角度，思考‘进步’的双面矛盾。‘进步’是向前步行之意，指涉事物、性质不断向好的方向进展。「进步」在20世纪初即是作为先觉者唤醒民众的重要口号，成为东亚的流行词。⁶⁹⁾‘进步’即是现代性所带来的期待效果，然而当殖民地台湾接受殖民主日本带来的现代性时，这个现代性虽带来现代建设、现代知识，殖民地人民却难以全盘承受，一方面在於现代性的施行有著阶级落差，另一方面也有殖民政府面对现代性的种族差异。

赖和体认到殖民现代性的内在冲突，他希望透过启蒙教育与揭露殖民地现实，呼吁台湾民众抵抗殖民政府，争取更加公平合理的生活。无论是在〈一日里的贤父母〉、〈一杆糶仔〉、〈让步〉或者〈丰作〉中，都能看见赖和透过描写殖民政府透过法律、警察欺压台湾民众的情节，并从中感受到赖和的苦心经营。他用文学建立起反殖民文学的传统，也用文学留下殖民时代的众生相，而赖和因治警事件入狱的经验，也使他的反殖民实践更集中於殖民体制的批判，尤其在法制与施行法制的警察角色上。此外，赖和期待能透过知识让殖民地获得解放，然而他也因意识到知识份子与民众之间的认知落差过大，因此无论是小说〈阿四〉、〈归家〉或者〈赴会〉中，都能看出赖和的痛苦挣扎，甚至到最後一篇小说〈一个同志的批信〉，更是透露出对启蒙运动的重大挫败与颓丧。综合观之，赖和小说所刻划的知识份子形象，著重於彰显出一个社会实践者的外在与内在的辩

69) 沈国威(2014: 304).

证, 实践主体经常维持著一种自我分裂、自我矛盾、自我辩证、自我成长的动态精神图景。70)

那麼, 在当代, 我们(重)读赖和的意义何在呢? 事实上, 本文认为, 100年前的赖和文学, 的确能提供给当代的我们许多思考可能。这或许与本研究团队在教学现场的经验有关。本研究团队曾分别在台湾与韩国教授台湾文学相关课程, 并与两地之大学生、研究生一同阅读赖和小说。由於台湾与韩国共有的日本殖民经验, 使得韩国学生对赖和小说中的反殖民意识相当有共鸣, 韩国学生甚至对於殖民警察的蛮横无理能直接感觉气愤, 这与韩国社会至今仍与日本有著战争历史、经济贸易造就的恩怨情仇不无关系。相较之下, 台湾学生在读到赖和小说时, 气愤之余, 却也同时忆起日本在台湾因为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良善发展, 甚至台湾社会在战後因为经历国民党政府的戒严统治, 在认同政治上, 产生许多分裂, 导致虽然台湾也曾经历过日本殖民, 却因战後的政治发展, 使得台湾现今仍不乏恋日情怀者。

当代的我们早已经历好几个世代的新知识洗礼, 我们透过教育与资讯科技, 得以先备并不时更新各种知识, 这些知识可能一样用进步的论述, 包裹著各种涉及阶级、性别、种族等等的不平等现实, 而我们是否也能如赖和一样, 觉察出日常生活中包裹著‘进步’外衣下的各种矛盾? 或者敏锐地看出被‘幸福’论述围绕而生的那把双面刃呢?

【參考文獻】

1. 저서

라이허 지음; 김혜준, 이고은 [공] 옮김, 《뱀 선생》, 서울: 지식올만드는지식, 2012.

송승석, 《식민주의, 저항에서 협력으로: 일제말 타이완 일본어 소설선》, 서울: 역락, 2006.

70) 吴兰梅(2015: 438).

- 張我軍,《張我軍詩文集》,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9.
- 施淑編,《賴和小說集》,臺北:洪範,1994.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2011.
- 賴和著,林瑞明主編,《賴和全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
- 柯志明,《米糖相剋》,臺北:群學,2006.
- 賴和著,蔡明諺編,《新編賴和全集(貳)·小說卷》,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前衛出版社,2021a.
- 賴和著,蔡明諺編,《新編賴和全集(肆)·散文卷》,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前衛出版社,2021b.
- 王銘銘,《想像的異邦——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散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吳蘭梅,《賴和·臺灣魂的迴盪——2014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縣文化局,2015.
-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研所,2010.
- 陳建忠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賴和》,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
- 陳建忠,《書寫臺灣·臺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
- 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文學論集》,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
- 葉石濤編譯,《臺灣文學集2》,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
- 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爲「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 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er)著;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台北:巨流圖書,2003.
- Tani E. Barlow,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소논문.

- 金苑,〈賴和 작품에 사용된 언어 양상의 변화 고찰〉,《中國語文學論集》,第65

- 號, 2010a.12.
- 金苑, 〈라이허(賴和) 작품세계와 타이완신문학〉, 《아시아문화연구》, 제20집, 2010b.12.
- 金尙浩, 〈賴和與朝鮮‘詩僧’韓龍雲民族意識新詩之比較研究〉, 《동아인문학》, 2008.6.
- 于翠玲, 〈啓蒙的先行者：以賴和書寫語言轉化的意義爲中心〉, 《中國人文科學》, 第64輯, 2016.12.
- 于翠玲, 〈殖民統治時期韓國與台灣知識份子的反思與批判性文學表現：以蔡萬植「成品人生」與賴和「惹事」爲中心的比較分析〉, 《中國人文科學》, 第58輯, 2014.12.
- 史民(吳新榮), 〈賴和在臺灣是革命傳統〉, 《臺灣文學》, 第2輯, 1948.9.15.
- 花村(黃春秀), 〈從舊詩詞起家的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臺灣文藝》, 第80期, 1983.
- 施淑, 〈稱子與稱鍾--論賴和小說的思想性〉, 《臺灣文藝》, 第80期, 1983.1.
- 朱實, 〈展望光復以來臺灣文運〉, 《龍安文藝》, 叢刊第1輯, 1949.5.
- 梁德民, 〈賴和是誰?〉, 《夏潮》, 第1卷第6期, 1976.9.
- 楊守愚, 〈賴和「獄中日記」序〉, 《政經報》, 第1卷第2期, 1945.11.10.
- 楊逵, 〈紀念林幼春賴和先生臺灣新文學二開拓者：幼春不死！賴和猶在〉, 《文化交流》, 第1輯, 1947.1.15.
- 楊雲萍, 〈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 《臺灣文化》, 第1卷第1期, 1946.9.
- 毓文(廖漢臣), 〈諸同好者的面影(一)〉, 《臺灣文藝》, 第2卷第1期, 1934.12.
- 汪俊彥, 〈另一種群衆想像：現代性與殖民時期的劇場〉, 《臺灣文學學報》, 第22期, 2013.11.
- 沈國威, 〈近代關鍵詞考源：保守、進步、進化、退化、退步〉, 《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6期, 2014.
- 王錦江著, 明潭譯, 〈賴懶雲論：臺灣文壇人物論(四)〉, 《臺灣時報》, 第201號, 1936.8.
- 陳佩甄, 〈現代‘性’與帝國‘愛’：台韓殖民時期同性愛再現〉, 《臺灣文學學報》, 第23期,

2013.12.

陳明台, 〈人的確認—試論賴和先生的人本意識〉, 《臺灣文藝》, 第80期, 1983.1.

3. 학위논문

宋承錫, 《日據末期臺灣日語文學研究》, 博士學位論文, 延世大學 中語中文學科, 2004.